

求真的“第二作者”

——试析口述史中采访者的功能

王 军

(国立华侨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21)

[摘 要] 口述史中采访者与传记作者有着明显的差异。采访者参与到口述史中经常是为了引导讲述者讲述往事, 而不是为了塑造讲述者的人格。采访者面对的讲述者不同, 采访者对讲述者的态度与努力程度就会不同, 两者在谈话中的关系也不相同。采访者参与到口述史的创作之中, 并对其最终形态负责。

[关键词] 口述史; 采访者; 传记作者

[中图分类号] G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0292(2012)01-0117-05

口述史作为一种特殊的传记形态, 区别于传统传记的最大特点是它由采访者、讲述者共同完成、共同负责。华裔美籍学者唐德刚教授曾经参与了多部口述史的采访与整理。其中, 顾维钧的口述史先后有5名采访者, 顾氏最满意的是唐德刚。因为顾氏从政时间太长, 对早期的事件记忆已经模糊, 而唐德刚“是学历史的, 凡涉及到的历史事件”, “就想方设法将有关的资料查找出来, 加以补充和核对”^{[1] (P86)}。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胡适口述自传》的创作中。唐德刚表示“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 另外的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资料加以印证补充。”^{[2] (P2)} 军人出身的李宗仁的口述史中, 本人口述的比重更只有15%, 其余要靠采访者查找资料。因此, 唐德刚得出一个经验式的结论“一般而言, 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只有50%~60%; 而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大概只有15%~20%左右。”^{[2] (P3)} 口述史料之外, 组成口述史其余40%

~85%的部分就是采访者的贡献, 可见采访者在口述史的完成中扮演了极重要的角色。

如果讲述者是普通民众, 采访者则不需要也不可能花费这么多的精力, 但仍要“做好准备, 以便了解被采访者所归属的类型或亚类型的态度、词汇和身体语言”^{[3] (P10)}, 以保证口述访谈的顺利进行和完成。

做口述史是为了保存史料, 采访者的资料功夫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一目的能否实现。以唐氏最精彩的《胡适口述自传》为例, 曾经盛传的“先看德刚, 后看胡适”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唐德刚自己查找的40%~50%的资料和他做的占全书篇幅38%的注释^{[4] (P52)} 极有价值。

采访者的角色在传记史上有过先例, 司马迁、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都曾采写史实。西方的经典传记《约翰逊传》、《歌德谈话录》也是一人口述、一人记录的, 《约翰逊传》的作者“包斯威尔使用的基本上就是采访者的那种方法, 尽管谈话原本不应该是一方聆听另一方说话”^{[5] (P33)}。但采访者不同于传记作者的地方是

[收稿日期] 2012-01-05

[基金项目] 2011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境外中国现代人物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11&ZD138); 2012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口述自传研究”(12YJC751080); 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2011年度一般项目“口述史研究”(2011B158)

[作者简介] 王军, 国立华侨大学文学院讲师, 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西方文学与文化理论。

明显的：他无法通过自己的资料收集工作来完成最终成书的作品，必须要借助讲述者的口述。传统传记大多是由传记作者自行搜集资料撰写的，也有少数例外，如记言体的《约翰逊传》。那么《胡适口述自传》的采访者与《约翰逊传》的作者角色究竟有何不同？

《约翰逊传》是包斯威尔“用了21年的友谊和耐心换来的”^{[6] [P8]}。包斯威尔的谦恭、自嘲和对约翰逊的尊敬、崇拜、热爱使他对约翰逊始终是仰视的，“对包斯威尔来说，约翰逊就是伦敦的灵魂”^{[7] [P65]}。约翰逊认为传记最好由传主本人来写，他说“不是文笔不优美，而是因为他没有什么材料。没有谁可以写一个人的生平，除非他与这个人在社会交际中同吃同饮同住。”^{[8] [P474]}包斯威尔正是通过做到“同吃同饮同住”来获得“材料”的。究竟包斯威尔与约翰逊两人见面多少次，有多长时间，这一直存在争议。目前至少有三种公开的说法，分别是180天、约425天、327天，其中最可信的是第二种^{[6] [P246]}。包斯威尔付出了极大的精力，收获了约翰逊的信任和友谊，写出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传记之一，却被人怀疑人品有问题^{[7] [P9]}——他以自己的名誉作为代价换来了《约翰逊传》的成功。

包斯威尔把约翰逊当作了崇拜的对象，他把自己的主体性依附于对约翰逊言语的记录之中。类似情况也发生在《歌德谈话录》的写作中。这两本书的共同点是，一个居高临下的长者的谈话，被一个崇拜者忠实地笔录下来。这种不平等的地位也使得传记作者作为著作权人，却无法享有对传记的话语权。包斯威尔使用了各种谈话技巧来引出约翰逊的连珠妙语，如“引入一个话题、下一个结论或者提出问题来引出约翰逊的回应”，偶尔“他会扮演更积极的角色”^{[9] [P27]}，又如他安排了本来不会发生的约翰逊与约翰·威尔克斯的见面和谈话。但不论包斯威尔如何处心积虑或者虔诚，他与约翰逊的“谈话很明显是由约翰逊控制的”^{[9] [P27]}。此时他没有自己的独立声音：倾听而不宣讲。因此，他的身份异常尴尬：包斯威尔被认为是阿谀奉承者，艾克曼不能保证自己对《歌德谈话录》的著作权。“一个西方的传记作者或者自传的引出者更乐意在‘伟人’传统的文化典范内行动，在这个传统中，一个生命的故事，是个体的线性过程，是一个从

重要的社会语境孤立出来的英雄获得公共认可的故事，是一个强调人格发展的过程。”^{[10] [P21]}包斯威尔和艾克曼在“伟人”及其声音面前是沉默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德刚在口述史中发出了怀疑的声音。不论是对被奉为“胡文公”的胡适、“一代天子”李宗仁还是外交界的传奇人物顾维钧，唐德刚都没有一味听从。他对胡、李的谈话有着戒心：因为他是从史学家的眼光来考求史料，而胡、李可能会提供不实的史料，同时他还要时刻留意通过对话来引出有价值的史料——他提出的“问题决定了讲述的方向和重点，甚至采访者的沉默都有意义”^{[10] [P21]}。最重要的是，他不再被动，而是与谈话者形成了对话。在谈及胡适在美求学期间对康奈尔大学教授的感恩时，唐在注释中这样说“胡适之先生乃至和胡氏同辈的有观察力、有学养的老辈留学生，他们言必称美国，并不是如一般洋奴大班的‘崇洋’。只是他们早年，乃至暮年，对美国的基督文明的感染，就始终没有跳出笔者上述的那个阶段。”^{[11] [P43]}这一批评，是以与传统传记作者相类似、又有不同的口述史采访者的身份进行的。采访者不是如包斯威尔般一味忠实笔录，而是以自己的学识、观点参与其中。胡适曾经问“德刚，我应该怎么说？”^{[11] [P230]}，而在《约翰逊传》中，约翰逊是不会向包斯威尔请教的。另一处胡适问的“我们还可以谈多少时间？”^{[11] [P260]}则说明采访在很大程度上要依据采访者的意愿。

包斯威尔对约翰逊的话全盘照抄，这样的情况在口述史中是不存在的。以《李宗仁回忆录》为例，唐德刚即认为“李氏所能提供的故事，只是一堆‘原始史料’而已。他偶发牢骚，那也只是这位老将军个人的成熟或不成熟的个人意见”^{[12] [P794]}。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唐即减少访问次数，设定背景由李宗仁口述，然后唐“独坐研究室，广集史料、参照笔记、搜肠刮肚”^{[12] [P795]}，写出纸本。唐德刚对口述的过程、最后写成的文本都拥有相当的决定权。采访者不仅仅是记录者、笔录者，他参与了口述史的创作。

以上论及的文本，都不是传统传记和口述史

各自领域的一般情况。更多的传记不是记言的，而是传记作者搜集已故人物的资料，进而描述、勾勒此人的行迹、形象。口述史也日益人民化，在以普通民众为讲述者的口述史中，采访者如同传记作者一样，拥有了更大的权威。

如英国学者保尔·汤普逊所言“口述史特别适合于课题工作，它不仅可以成为群体，也可以成为单个学生的事业：不管是在学校、大学或学院，还是在成人教育或社区中心。口述史可以随时随地落实下去。在国内任何地方，口述史都可以成为地方研究的丰富的主题：如地方工业或手工业史、特定共同体中的社会关系、文化和方言、家庭的变迁、战争和罢工的影响，等等。口述史课题肯定是可行的。”^{[13][P9]} 采访者为了完成一个课题进行采访，必然会把讲述者作为史料的来源或者自己观点的佐证，采访者因此具有了先天的优势：他设计课题、寻找谈话对象、提出话题、确定谈话范围、引导谈话发展方向。为普通民众做的口述史，基本就是采访者意图的体现。《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中有三卷《幸存者调查口述》，就是研究者及相关人员以搜集史料为目的展开的口述采访。在采访者，这是“义不容辞的使命感和责任感”^{[14][P284]}的体现，而讲述者就是史料（提供者）。2005年，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去世，南京师大张连红教授为其不公正待遇鸣不平“很多人有个误解，等到需要幸存者的时候，就把他们请出来说几句话，平时就很少关心他们。其实对于自己的往事，幸存者有权利说，也有权利不说，他们是人，而不是工具”^[15]。这恰恰说明在普通民众的口述史中，采访者拥有对讲述者的绝大权威，经常把民众当作工具，恰如传记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愿使用传主材料。

传记作者在面对众多材料时，选择的是最有利于表现传记人格的材料，“这是因为传记关注的首先是人，其次才是事件；对传记家来说，揭示那些以传主为中心的意义联系才是他们的更高任务。”^{[15][P174]} 高明的传记作者通常在材料的选择上显示出他匠心独具。

日本医学奇才野口英世曾被众多传记作品偶像化、英雄化，成为“野口英世神话”。渡边淳一在参考诸多已有传记、广泛采访的基础上写成了《遥远的落日》，既不讳言野口英世“嫉妒、

自我显示欲、妄自尊大”等缺点，又真实地刻画了他“竭尽全力地活着”的感人一面。渡边有“赤裸裸地描写男人的本质、本性的强力意识”^{[17][P468]}，所以对野口英世有如此精准把握。不同传记作者对传主的不同把握，既反映出其不同的出发点，也说明传记作者对传主形象的塑造有相当的决定权“传记作者是生平的第二作者，或者说是编辑。”^{[18][P3]} 当生平的第一作者即传主本人在世的时候（特别是当传主对传记作者拥有极大影响力时），传记作者不得不尊重其权威，有时甚至只能笔录其言词。当传主去世后，传记作者的写作就不再如此简单。他遇到了困难。首先是处理材料的问题，“他不得不依赖他人的报道、或者他人已付诸文字的话语、或者对象本身（的文字）”^{[19][P17]}；其次是主观的困难“传记作者很容易被（道德、政治、社会和个人的）偏见和先见误导。他几乎肯定对传主有喜爱或厌恶之情，这都是不可避免的，会扭曲、破坏他的描绘。”^{[19][P17]} 传记作者对传主的解释因为传主的缺席显得合理。传记“为一个人借助更有名的亲友提供了进入被记录的历史的手段”^{[20][P3]}，更是“一个反省的所在，一个人在那里主动地建构和反思发展中的身份/主体性”^{[21][P7]}。“作为传记作者的历史学家要面对讲述历史还是讲述生命的双重挑战。”^{[23][P1]} 历史上很多精彩的传记作品都是因为出色的文学技巧而不是因为历史事实流传下来的。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谈到关于玛丽女王的互相矛盾的材料时说：“如果无法回避地要在这种或者那种看法中选择一种，那么决定取舍的根本准则，便是那种行为在心理上是否符合整个性格。”^{[23][P3-4]}

口述史中采访者对讲述者的批评，则是出于史学家的“科学”态度。他的难题在于他追逐史料而讲述者的讲述却未必就是史料，于是他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对史料的考求上。

传记要写一个人的生平，要写出传主的人格，要对传主的人格进行解释，这都是传记作者的工作。这些在口述史的采访者那里不再重要。首先，口述史关注的不是人，而是事实。特定的讲述者被列入口述史，并不是因为其人格高尚，而是因为其经历的史料价值。为此，采访者要有确定的课题——“口述史尤其适合课题操作”^{[13][P204]}。课题的设计也体现了采访者的主体

性,他通过引导讲述者的讲述参与自己的意见,虽然讲述者并不总是如其所愿。

三

普通民众的人格通常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在被置放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背景中,则变得更加渺小。在《口述历史导论》中,作者描述了学生应该怎样做口述史:他们“要选择一个文化历史的课题,这个课题可以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或者延续,这些思想观念存在于风俗习惯——从艺术创作到街头游戏——之中。少数民族裔是很好的资源,因为他们为了适应美国社会经常要作出巨大的变化和调整”^{[24] [P48]}。要求这些学生描绘讲述者的生平、解释他们的人格,是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随着口述史的人民化,需要做的采访工作越来越多,口述史也不再是史学家的自留地,更多的新闻工作者甚至略经训练、未经训练的学生也投入到挖掘史料、抢救历史的工作中。他们“由于没有受过正规的培训,在操作中出现很多问题,诸如没有考虑专利权问题,访谈的主题经常偏离,受访者不愿坦诚地讲述。很明显这些问题在专业的口述史学家身上是很少遇到的”^{[25] [P251]}。当然不能排除采访者关怀作为讲述者的普通民众的可能性——事实上,这种关怀是存在的,也因为对普通民众的重视,口述史才会蓬勃发展——但是在采访者的眼中,更重要的是南京大屠杀或者另外的某史实,而不是某个幸存者的人格,更谈不上对其人格的解释。

同时,不是每一个讲述者都能进入口述史,采访者要对口述者进行筛选,这更加说明了讲述者的从属地位,只有采访者才是口述史的主导角色。保尔·汤普逊为创作《爱德华时代的人》采访了500多人,这些人涉及了娱乐、犯罪、贫民窟外的都市生活、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女工、未加入工会的男性工人、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社会行为、儿童、婚姻等。作者希望能够藉此“自下而上的观察以发现爱德华时代社会究竟是怎样运作的”^{[26] [P344]},同时“把自己限制于变化着的以及当时的人力图要加以改变的英国社会”^{[26] [P344]}。最终只有符合其考察动机的100多人进入了《爱德华时代的人》。

普通民众从一开始就在采访者划定的范围之内。中国大陆较早开展口述史的定庄宜,如是介

绍自己采访旗人妇女的原因:首先她们是特殊的少数民族,“从边缘到中心再到边缘的矛盾在这个民族身上表现得分外突出而且淋漓尽致”;其次,“即使是这些文盲的、半文盲的、极少受到官方话语影响的下层普通妇女对于自身经历的口述,也几乎都可以与文献一一互补和互证”。“通过对访谈对象和访谈计划的不断调整”,她把访谈主要集中在旗人妇女的集体记忆、生活婚姻。“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妇女的家庭变迁和个人的生活经历”^{[27] [P7]}。此即所谓目的决定态度和行动。

最后有两个问题需要指出:一个是采访者的采访受到众多因素的限制,包括政治等外部因素,也包括采访者个人素质等内部因素。唐德刚在为张学良做口述史的时候,就遭遇了台湾当局的严密控制,甚至无法继续采访,遑论成书^{[28] [P1211]};另一个问题是,采访者做口述史,对他自己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进步契机。以定庄宜为例,她即通过采访改变了对旗人妇女的一些旧有的错误认识^{[28] [P35]}。

[参 考 文 献]

- [1]唐德刚,王书君. 顾维钧回忆录的撰写秘史[M]//唐德刚. 史学与文学.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2]唐德刚. 文学与口述历史[M]//唐德刚. 史学与文学.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 [3]Susan M Armitage, Patricia Hart, Karen Weatherman, Women's Oral History: The Frontiers Reader [M].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2.
- [4]朱旭晨. 《胡适口述自传》的注释艺术[J]. 东岳论丛, 2005 (1).
- [5]Donald J Winslow. Life - Writing: A Glossary of Terms in Biography, Autobiography, and Related Forms [M].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5.
- [6]罗珞珈,莫洛夫. 译者序[M]//包斯威尔,约翰逊传. 罗珞珈,莫洛夫,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7]Richard B. Sher. "Something that Put Me in Mind of My Father": Boswell and Lord Kames [M]//Irma S. Lustig. Boswell: Citizen of the World, Man of Letter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5.
- [8]James Boswell. Life of Johnson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9]Greg Clingham.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Samuel Johnson [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0] Martin Cortazzi. *Narrative Analysis* [M]. Routledge (UK), 1993.
- [11] 唐德刚. 胡适. 胡适口述自传[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
- [12] 唐德刚. 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的沧桑[A]//唐德刚、李宗仁. 李宗仁回忆录[C].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 [13] 保尔·汤普逊. 过去的声音: 口述史[M]. 覃方明, 渠东, 张旅平, 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
- [14] 王俊义. 《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前言[M]//王俊义, 丁冬. 口述史: 第一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 [15] 解璐. 桑桂兰, 有一大屠杀幸存者走了[N]. 现代快报[N]. 2007-09-27.
- [16] 杨正润. 传记的要素[J]. 江苏社会科学. 2002 (6).
- [17] 清源康正. 解说[M]//渡边淳一, 芳子. 遥远的落日.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2.
- [18] Jay Martin. *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 A Biography* [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 [19] Gamaliel Bradford. *The significance of Biography: A Foreword*[M]// James C. Johnston. *Biography: The Literature of Personality*. Kessinger Publishing, 1927.
- [20] Ana K. Kuhn. *The "Failure" of Biographer and the Triumph of Women's Writing: Bettina von Arnim's Die Gunderode and Christa Wolf's The Quest for Christa T.* [M]//Susan Groag Bell, Marilyn Yalom. *Revealing Lives: Autobiography, Biography, and Gend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0.
- [21] Paula Nicolson. *Gender, Power and Organization: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M]. Routledge (UK), 1996.
- [22] Lloyd E Ambrosius. *Writing Biography: Historians and Their Craft*[M].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4.
- [23] 茨威格. 玛利亚·斯图亚特[M]. 赵燮生, 谭渊, 译.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2.
- [24] James Hoopes. *Oral History: An Introduction for Students* [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9.
- [25] 杨祥银. 与历史对话: 口述史学的理论与实践[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26] J. O. Baylen. *Review of The Edwardians* [J]//Societas, Spring, 1977.
- [27] 王书君. 张学良世纪传奇[M].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2.
- [28] 定庄宜. 我什么光都没沾着[M]//定庄宜. 最后的记忆——十六位旗人妇女的口述历史.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1997.

The Second Author for Truth

——An Analysis on the Function of the Interviewer of Oral History

WANG Jun

(College of Literature , Huaqiao University , Fujian 362021 ,China)

Abstract: The interviewer of oral history differs from the traditional biographer. His presence in oral history is for truth from the narrator, not to describe the narrator's personality. He shows different attitude and efficiency when facing different narrators. The interviewer is a part of the completion of oral history and is co-responsible for its product.

Key words: oral history; interviewer; biographer

[责任编辑 薄 刚]